

从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外贸的衰退

看国民党政权在天津统治的覆灭

姚洪卓

国民党政权在天津统治的覆灭，有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原因，而其经济的全面崩溃则是其根源。外贸是经济的重要部分。它的衰退是经济崩溃的表现，因此考察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市外贸的衰退有助于我们对天津解放的了解。

一、

日本投降后，中国并未获得独立，只是由战前的英美两国所操纵及大半中国被日本所侵占的局面¹变为美国一国所控制的局面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亦旧未变。二战结束，德、意、日法西斯彻底战败，在华势力全部瓦解，与津贸易暂无可能；英、法等国被战争拖得精疲力尽，在华势力已日落西山气息奄奄，英国虽试图捞土重来，重振在华实力，但已力不从心；战后能在中国称王称霸的就只有在两次大战中发了横财而崛起的美帝国主义。

战后美国实力最强，既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债主，又是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大本营。在华实力的膨胀为任何一国所不能比伦。它以政治、军事、经济的实力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新

的侵华条约，其中尤以1946年11月签订的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最为突出，进而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陆、海、空所有权利统统控制了起来。就中国外贸而言，美国通过1947年10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国际关税和贸易的一般协定》，明确地规定了输入中国的110种美国商品分别予以减免关税，使美货像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天津成了美货输入的重要口岸。

抗战胜利，中国人民结束了八年沦亡生活，渴望建设一个新中国。日本一投降全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好的势头，市场繁荣、物价猛跌。当时重庆的物价指数在1945年8月为175,500元（法币），9月下降到122,600元，10月又下降到118,417元；上海的物价指数也由1946年8月的43,200元下降到9月的34,508元。①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积极推行“独裁、卖国和内战”的政策，很快就使抗战胜利后出现的一派繁荣和建设景象化为乌有。内战城乡生产受挫，工商停滞、交通中断、物资奇缺、物价暴涨；而国民党政府还趁机巧取豪夺，滥发纸币，搜刮民财，把大量的社会财富搜到四大家族腰囊。滥发纸币的结果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以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赤字猛增，整个经济处于萧条和崩溃之中，并日益加剧，加速了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垮台。

抗战胜利之初，天津外贸开始兴起，很快就一扫太平洋战争时

期的停滞、衰退、枯竭之势。1946年3月，政府采取了恢复外贸的政策和措施，加上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对全国政局的控制，外贸便出现了一个好的发展局面。就天津外贸言，1947年比1946年的进出口货值提高了0.9%，为解放战争期间天津外贸发展的最好年份。然而1947年底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军事上节节失败，特别是战场由解放区转到国统区，尤以1947年11月间石家庄解放，国民党政权在华北统治处在个崩溃的前夜，华北政局动荡不安，平津军事当局加强了天津物资输出的控制，天津外贸便急转直下，天津的国民经济处于全面的崩溃之中，国民党政权在天津的统治也就摇摇欲坠。

1948年天津外贸急转直下，可从货值成倍表退得到证明：进口货值1948年是1947年的2854%，出口货值1948年是1947年的41.77%。②至于进出天津口岸的船只吨位数1946年为1172244吨，1947年升到2405125吨，1948年又到2879352吨的年年上升状况，③并非是天津外贸的发展，倒是国民党政权在天津统治覆灭的反映。1947年进出天津口岸的船只吨位数比1946年上升了一倍还多，但其货值却只增长了0.9%。1948年进出天津口岸的船只吨位数比1947年增长约20%，而货值反减少了64.95%。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船只吨位的增长实非是外贸发展的反映。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① 由于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大量军火和军事物资从天津口岸输入；

② 国民党政府搜刮民财的政策，迫使华北平津大户人家纷纷转移财产。如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颁行金元券收兑民间黄金、¹⁸美钞的消息得到天津后，“天津市场一度混乱”，引起了“天津存有黄金、美钞的大户，纷纷将财产逃往香港，一时从天津开往香港的船票忽然紧张起来，且有船票黑市出现”④就是明证。

③ 1947年底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失利，政治上不得人心，石家庄解放后华北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下，国民党败局已定，时局动荡，因而平津地区要人及社会贤达与绅商人士纷纷向南转移财产或举家南逃。南逃之路又仅海道一途，因而开往上海方面的船票空前紧张，辽沈战役后南逃之风达到极点。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内外形势极不利于天津的外贸发展，致使天津外贸不仅未达到战前水平，也未能达到太平洋战争前的水平。

二

战后天津外贸的兴起，尤其是1947年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最好一年，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国民党政府颁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等外贸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胜利后天津外贸的迅速兴起，一是八年沦陷广大城乡积压了大批农副产品需要运津出口；二是辽阔的内地市场久久渴求从天津口岸获得进口外货；三是战后中国面临百废待兴的建设局面，需要进口大批物资以利生产和建设；四是战后美国迫不及待地将战时所存物资抛入市场，而以“救济”名义源源输入天津；五是胜利后的中国商人在进口洋货有利可图的刺激下，纷纷组织起了海外贸易公司和商行，天津新成立的百余家贸易商行积极从事外贸活动；⑤六是胜利初期国民党政府对外贸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等。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恢复对外贸易时，由于饱受抗战时期洋货进口之困难和当时外汇供应还较充分，便推行了半自由化的外贸政策，“仅一小部分货物加以管制，其他绝大部分均可自由进口，自由申请外汇”⑥。其实质是鼓励进口，自由出口。凡是工业原料及器材均可自由优先进口，消费商品只要申请即可进口，就是奢侈品在缴纳50%的附加关税后亦可进口。出口商品不受限制，任由商家自由出口。这一政策执行结果是进口猛增，出口萎缩，外汇空虚，贸易逆差日益严重。就天津外贸言，入超虽不严重，但发展不旺，进口增长快，出口发展慢，外汇紧张。鉴于这种情况，国民党政府将半自由化的外贸政策改为“输入限额与输出推广”、“易货与统销”的外贸管制政策，又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管制外汇”及“进出口配额制”等一系列措施。先后颁行了《进

出口贸易暂行办法》、《管制外汇暂行办法》，以及《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附表》等。将进出口商品分为三类：即自由进出口类，许可进出口类（需加批准），禁止进出口类。⑦1946年11月间又修改了《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对进口商品实行许可证和征收50%的附加关税。把进口商品分为四类：即进口设备优先进口，工业原料进口不加限制，非定额进口必须批准，以及绝对禁止进口商品等。⑧为此还成立了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和输出推广委员会，1947年8月二者裁并为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简称“输管会”）专司进出口事宜。该会成立后的五个月里发表了有关进出口贸易问题的12个公告。同时政府又公布了五个附表，把进出口商品详加作了规定。附表中的进口商品由于外汇短缺，入超猛增，除附表一的商品能批准进口外，附表二、三所规定的商品进口是难以批准或只部分批准，至于附表四所规定的商品就根本批不准了。

为了限制进口，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底实行外汇配额制。“输管会”成立了输入限额分配处专司其事。授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各地商家进口洋货须向中央银行指定的各地银行申请外汇配额，获准后方可进口。然而外汇配额分配极不合理，全国外汇配额的80%配给上海，天津区（包括华北和东北）只配给5~10%⑨，实际上天津只有5%。天津外汇配额如此之少是国民党政府惟恐输入天津之货流入解放区。1948年1~9月配给上海的外汇达到

了 1123 0012605 美元，而给天津的只有 12772529.55 美元，
仅及上海的 18%，⑩激起了平津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商家举代表向
政府请愿、抗议，要求“输管会”参照平津两市的实际出口数字合
理地配额外汇。外汇配给的不合理还表现在：需要外汇的商家却得
不到足够的外汇，不需要外汇的商家却能获得足够的外汇。一般说
来能得到足够外汇的商家不是官商就是与官商有瓜葛的商家。在洋
货进口能获厚利，外汇又难获得的情况下，外汇黑市买卖相当猖獗，
得不到足够外汇的商家只得向黑市高价向无路进口外货而又有足够
外汇的商家购买外汇，持有足够外汇的商家将外汇一转手即可获利
50%，于是天津就出现了一批专门吃外汇投机利润的商家⑪。可
见外汇配给制度的弊端，有时起了扰乱外贸的作用。

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外汇配给等政策和措施，在于求得进出
口贸易的平衡。但结果是事与愿违，走私、外汇投机加剧了出口的
不振，进口高于出口。就天津进出口贸易的比例而言，1946年
竟是 2:1。⑫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又推行进出口连锁制政策，
即进口货值必以出口货值为限，由出口货所得之外汇购进外货。还
规定：第一、进口工业品、工业原料和生产器材尽量采取贸易制度；
第二、国内能生产的商品尽量少进或不进口；第三、确定一些重要
物资以推进进出口连锁制，如以棉纱、丝织品向南洋及印度交换棉
花、米、麻等，以桐油、猪鬃、矿产品同美国交换通讯器材等。⑬

但是连锁制则要求贸易商家同时经营进口和出口的贸易业务，能同时经营进出口业务华商不多，多数华商势小力微，资金短缺，实难胜任。能同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不是洋行就是官商或大户。它们根基粗、资金足、势力大，常以独霸或垄断一些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来破坏贸易连锁制。政府却奈何不得。所以进出口贸易连锁制既难推行，也不能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实现进出口平衡的目的。

严加限制洋货进口的结果是走私猖獗，尤以美货为最。它以商船或军舰夹带等方式向中国走私，天津口岸是美货走私的基地。

1946年天津口岸的走私货值达到了938,059,006元，仅次于上海和九龙。而进口走私的货值却达到了848422,000元，为进出口走私货值的90%，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⑩所以天津口岸的洋货进口并未因颁行限制进口的政策和措施而有所下降，相反还有上升趋势。

政府在大力限制进口的同时，积极推行鼓励出口的政策。为了解决外汇资金短缺，发展出口贸易，194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最高国防委员会，决议取消出口税，以资鼓励出口商品。1947年8月16日又在颁行的进出口贸易办法中规定了一切出口商品除附表中所规定者外，一律实行自由输出。^⑪同时又采取出口补贴、收购出口商品、调整外汇率、低息贷款给贸易商家等措施来推动出口贸易。

出口补贴。1947年2月政府施行对出口商家的补贴制度，按其出口商品所上缴的外汇数额给予法币补贴（按官价汇率计算），免其因官价汇率的波动所可能受到的损失。但这一措施却助长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商品出口成本，在各方面的反对下夭折了。

产品收购。政府鉴于商品出口的困难，决定收购一些出口商品，再由出口商家或国家有关部门输出，以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提高出口商家的兴趣。但效果不好。

调整外汇率。调整外汇率是刺激外贸发展的一种手段。外汇率调整提高一次，出口贸易就活跃一时，当外汇率调整之后，贸易出口也就随之停滞。1946年3月政府恢复外贸时，外汇市场是开放的，当时美元与法币的比率官价是1：2620元，是时出口贸易尚可，然而当黑市外汇价格大大高出官价比例时，出口贸易因无利可图而萎缩不前，是年8月汇率提到1：3350元时，出口贸易有了活跃，但不久又停滞了，1947年2月又将汇率提到1：2000元，出口贸易比前有了发展，但很快又停滞起来。可见靠提高外汇率来刺激出口贸易的发展绝非长计，其生命力也很有限，最后贸易出口还是停滞了下来，实非解决出口贸易的根本途径。而根本途径在于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根本改善。所以，战后天津外贸始终处在出口落后于进口。而外汇率的调整提高中国货币的更加贬值和物价的更加暴涨。外汇率的提高对美元币值毫无影响，而中国货币却成了废

纸，更有利美货的倾销。

低息贷款。出口商品的收购、加工、包装、候船装运均需大量资金。出口商人由于无利可图多不乐意从之，出口贸易更是萎缩不前。为鼓励和支持出口商家，帮其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政府决定以低息贷款给出口商家。贷款额为出口商品成本的70%，为期3个月，月息6~7%，比一般商业银行要少10~12%的利息。但因货币贬值，物价飞腾，银根吃紧便这一措施仅执行4个月后便停业了。

商品出口政府还规定了最低出售价格，如对桐油、猪鬃就有过最低出售价格的规定，目的在于防止官价与市场汇率间的差额，而使商家受损；当然也有防止一些商家低报商品出售价格而向国外转移资金；还有为杜绝出口商人在国外廉价脱销国货，以损生产者和守法贸易者的利益。

以上种种有关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措施，均因国民党政府推行内战的总国策而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三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危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个方面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天津的统治也处在崩溃前夕，进出口贸易急剧衰退，1948年同1947年比较，进口下降了

71.46%，出口下降了58.23%。其因是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卖国和内战的总国策所导致的。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腐败，以国无定策、政出多门、政策朝令夕改最为突出。就外贸方面的政策言，一方面在颁行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则采取了阻碍外贸发展的措施，如1947年2月初政府为发展外贸，复苏内地经济，决定鼓励出口，对出口的货物结汇从价补助100%的法币，进口货物一律征收50%的附加关税，但到了2月中旬外汇率调到1:2000元时，政府即行宣布废除出口补助及进口附加税。前后不到两周，竟然出现了两个互相矛盾的政策。前者是鼓励出口，而后者则鼓励进口。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把政府威信丧尽，严重地挫伤了贸易商家的积极性，打击了出口贸易的发展。^③

1946年7月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把全国划分为若干战区，对大中城市及战略要地实行军事管制，平津地区及平津两市是军管的重要地区和城市。石家庄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统治崩溃的开始。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控制，保住平、津、冀、鲁地区，1947年12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随之授以全权处置华北事宜。傅派亲信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从而加强了对天津这个北方贸易大港的控制。华北“剿总”成立后忠实推行“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④的

政策。为了实现这一政策，国民党平津军管当局对平津地区数十百种物资实行了军事管制。天津警备司令部还设立了“主要物资管理处”，审查输出天津的物资。先后列入管制之物有军火和军事物资和民间的吃、穿、用等物品以及交通与五金器材、药品、颜料等都在其列。以补食一项为例，从补食到瓜子，从肉类到水果，从主食到副食统统予以管制。1948年10月1日国民党天津当局竟出动军警对所有仓库、货栈、工厂、商店等所存之棉花、大米、杂粮、棉线、食盐、纸烟、纸张等八种物资强行登记和管制。^⑧

物资输出天津必持有物资输出“许可证”，否则即以“资匪”论处。而“许可证”的获得又相当困难，起初由同业公会在申请书上盖章，经警备司令部主要物资管理处批准发给，当国民党政权处于四面楚歌时的1948年8月间，又规定了同业公会盖章外，还得有国家商号担保，物资到达地方的机关亦需盖章，9月又规定“许可证”不得延期使用和转让，沿途军警和检查机关得在“许可证”上盖章，以示物资途径路线，货到达的当地商会或同业公会亦得证明，否则即以“资匪”处罚担保人。^⑨如此控制物资输出天津，天津外贸就不能不急剧衰退。1948年10月初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大举入关，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危在旦夕，华北“剿总”宣布全区实行戒严，物资输出天津更是困难重重，而“许可证”由华北“剿总”收去核发。这样既费时又费力，往往还误了货物输出的机

会，经呼请改由天津商会办理，但索费惊人。如利华商行申请一张物资输出“许可证”，竟索费达680余元，激起进出口公会函请答覆。②总之，物资输出天津困难重重就把这个华北进出口物资集散贸易大港变成了与国内外隔绝的死港。物资所有者为避免出入天津大道梗碍，只好就地出售商品不愿到津卖高价。当时杨村、北仓一带的农副产品所有者就宁可低价就地卖与解放区，也不愿来津招惹是非。③

石家庄解放后，华北解放区越来越大，而国统区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平、津、张、塘一线的几个据点，在这种形势下还继续推行经济上封锁解放区的政策无疑自取灭亡。为此冀省各界经济人士在1948年初组织了平津请愿团³赴平请愿，提出了八项有关改善恶化了的经济建议。④但政府当局不予重视，亦不与经济界人士合作，相反继续坚持推行对物资的军管政策，阻碍物资输出天津，顽固压制天津的出口贸易。如国际市场急需油脂，而天津存货又多，是出口的良机，而政府当局就是不予批准，以致错过机会，损失非浅。东北大豆的出口也是这样，每年可出口300万吨，亦因军管当局的限制只能出口10万吨。⑤可见国民党军管当局的倒行逆施政策和措施是1948年天津外贸急剧衰退的主要原因。

战争造成交通中断也是天津外贸衰退的因素。内战爆发后，华北是主要战场之一，石家庄解放、平汉、津浦、平线、北宁等四条

干线就处在双方争夺控制之下，进出天津的物资就难进行。由于天津同内地交通常常中断，在津的外地客商多有携席离去之势。当时在津的烟台、济南、石家庄、保定等地商人就因所购之物运不出去，便有就地处理离去的情事发生。在内地采购产品的中外商家也因之不能进行，如美商在内地收购猪鬃、毛絨由于交通受阻被迫停业。②向天津出口的物资也改道营销他处，如徐州的花菜和黑瓜子向天津转销沪^粵，而今只得直运沪市出售了。上海的香烟、米^西、纱、布和杂粮，往日多运津转销东北，而今只得直销东北了。仅以上几例，足见内战造成的交通中断对天津外贸危害之大。

综上所述，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外贸的衰退在于国民党政府推行“独裁，卖国和内战”总国策所导致的，而天津外贸的衰退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天津经济崩溃的表现，亦是国民党政权在天津统治覆灭的一个反映。

注：

①⑧张公权著、杨志信翻译：《中国通货膨胀史》48页，

215页 1986年8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②③《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④⑤⑥《天津历史的转折》30页、272页、296页，1988

年4月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

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天津《益世报》1946.5.21；1948.11.

4; 1947·2·17; 1947·1·28; 1948·12·10; 1948
8·5; 1946·6·5 .

- ⑤ 吴大明、黄宇乾等:《中国贸易年鉴》37页、62页、
271页·1978年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 ⑨ 《经济评论》5期21页·
- ⑪ 《北国春秋》1960年3期104页·
- ⑭ 《国际贸易月刊》1947年2月号·
- ⑰ 梁寒冰等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343页1984年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⑳ 《银行周报》32卷11期5页·
- ㉓ 张禹九:《中国对外贸易需要新政》·